

李向耕澄叢稿

李清渊 著

● 学林文存 ●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向耕證叢稿

李清淵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白辩证丛稿/李清渊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8

(学林文存)

ISBN 7 - 5034 - 1545 - 2

I . 李… II . 李… III . 李白 (701 ~ 762) —唐诗—文
学研究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9409 号

《学林文存》

李白辩证丛稿

责任编辑:张建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宏信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宏信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5 字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序

葛景春

李白研究是当今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李白研究迅速发展。一些老学者焕发了学术青春,重新主盟学坛;一些中年学者年富力强,成为学术骨干;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清渊先生毕业于原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他早就对文史考证工作感兴趣。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即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李白,心仪詹锓先生的人品和学问,后经乔象锺先生介绍,而师从詹先生于左右,历时十余年,得到先生的精心指点,学术研究上突飞猛进。清渊先生兢兢业业,埋头研究李白,至今已有 20 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他的李白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多种学术刊物上,有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所以很有必要編集起来出版。前不久,清渊先生来信说,他已完成这些李白研究论文的汇集整理工作,嘱我写一篇序文。按理说,这篇序文本应由恩师詹锓先生来作,但他老人家已作古。现在我蒙此托,既觉得义不容辞,又感到笔杆沉重,思之再三,才敢下笔,惟恐有负老友。

清渊先生研究李白,又主要集中在李白生平及其作品系年的考证方面。李白的生平,在唐代诗人中最具传奇色彩,但由于史料的缺乏,不仅留有很多空白,而且传说故事与史实交

织在一起,真伪难辨。因此,其作品的系年,也就有相当多的疑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学者继续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展开了关于李白“二人长安”、“三人长安”之说,以及李白出生地、生卒年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尽管到目前学者们在这问题上的看法上仍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其争论还是促进了李白生平及其作品系年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学术研究,只有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资料,并进行争论,分清是非,去伪存真,才能不断地进行学术积累,完善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学术争论本是学术研究正常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过程。而清渊先生考证李白的文章,就多是在与人切磋辩论中完成的,所讨论的学术问题,大至一段史实,小至一句诗。按其文章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作品系年的考辨,如《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异议》、《李白“三见秦草绿”辨》、《李白与崔宗之酬赠诗考》等。二是李白交游的考证,如《李白遇司马承祯之年考》、《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李白与李彦允交游探微》等。三是李白其他行年事迹的探讨,如《李白“隐于岷山之阳”别考》、《李白“中年”游吴越辨》、《李白事迹考述二题——从裴斐〈李白选集〉谈起》、《李白供奉翰林事迹考辨二题》、《李白“西来一摇扇”辨》等。这些文章,或补充、校订史料,或重新考释、阐发诗文,既能刨根问底,沉潜挖掘,又能触类旁及,由小见大,因而也就能常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自成一家之言。

清渊先生考证李白的文章,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由于根基扎实,勇于探索,言之有据,论不虚出,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小。尤其是他关于李白《玉真仙人词》作时作地,李白诗中“玉真公主别馆”在何地,“卫尉张卿”是何人的文章,对李白“二人长

安”说的几条主要证据提出质疑,并作出了新的推断,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对李白生平及其作品系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起了促进与推动作用。清渊先生不求文章多,但务其精。他的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说无根据的话,不说过头的话,实事求是,点透为止,体现了一种朴实无华的严谨学风。

当然,清渊先生的文章也不是篇篇尽善,一点缺陷也没有。作为考据工作,对资料的理解和处置如稍有不慎,那就会有所失误。作为一个研究者,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又要十分细致小心,力求科学严谨。但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谁也不可能保证不出错误。其实,即便出了点错误也无妨,改正就是了。因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科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克服错误,追求真知的过程。以上意见,愿与清渊先生共勉。

2003年11月15日

说 明

本集文章,是我以往十多年中参与研讨李白生平及其作品系年之作,均曾在国内公开或内部刊物发表过。这些文章的选题,起初并无周密的计划,但也主要是以李白两人长安之说为中心,就其研究中的一些可疑问题发表己见。今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篇目编次则略依所涉李白事迹年代先后和内容的关联性而组合序列,同时删订了少数篇章中的疏误和繁冗之处,另收录一篇詹锳先生与我联名发表的《明末李白诗两种注本》,其需要说明者,即作“附记”简述之。

李白生平及其作品系年研究中的大量疑难问题,须经集思广益、多层次反复探讨,方可逐步解决。我的这些文章,所述也多是探索性的见解,决不敢自以为是,聊资参考而已。其中的某些认识,我今后将会有所修改或拓展,更希望得到师友和同好的批评指正,故应称本集为“丛稿”云。

李清渊

2003 年 10 月于天津寓舍

目 录

序	葛景春 (1)
说明	(1)
李白“隐于岷山之阳”别考	(1)
李白遇司马承祯之年考	(5)
李白“中年”游吴越辨	(12)
李白《郢门秋怀》诗考析	(23)
李白斗“鸡徒”考辨	(29)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作年异议	(35)
李白娶安陆许氏之年考述 ——从裴斐《李白选集》谈起之一	(39)
李白赠卫尉张卿诗别考 ——附“张去盈为卫尉卿之辩证”	(44)
皇家“仙女”玉真公主	(58)
李白与崔宗之酬赠诗考	(61)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71)
李白天宝初年浪游长安考辨	(74)
《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写作时地别考	(86)

李白应征入长安之地考述	
——从裴斐《李白选集》谈起之二	(88)
读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三题	(99)
李白供奉翰林事迹考辨二则	(109)
李白“西来一摇扇”辨	(116)
李白与李彦允交游探微	(125)
李白与“贺公”交游新说订补	(136)
李白酬张卿诗臆说	(143)
李白“抱子弄白云”别解	(148)
明末李白诗两种注本	(152)

李白“隐于岷山之阳”别考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

又昔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

王琦《李太白年谱》认为，李白此文“先言隐居岷山，后言投刺苏公。玩其文义，作两段叙述，非接次而言者。州举有道，应是见苏公以后事”。近人则多从此说，故将“州举有道”事推在开元八年或九年以后。但也有少数学者不同意王琦的说法，如郑文《略谈李白出蜀前后所作诗歌及遇赦后短期行踪》一文就批评王琦“是将太白原文，斩成两截以就己意”（见《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五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按《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一篇论说性文章，其记事则多是为了论证作者的品行和才能，的确不能据其叙述顺序推定诸事发生时间的先后。《新唐书·李白传》先说隐岷山之阳事，后叙见益州长史苏颋，这固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像王琦那样把这两件事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我以为也不能说是言之有据的。因此我想，看能不能从“州举有道”的考察中来解决问题。

“广汉太守”（指当时的绵州刺史）举荐李白和东严子是因

为他们有“养奇禽”之术，可见“有道”即“有道术”之省文。这类特殊技艺被视为“道术”，盖亦崇信道教神仙方术的社会风尚使然，且非自唐朝始，如《南齐书·高逸列传》记载：

永明中，会稽钟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养鼠数十头，呼来即来，遣去便去，言语狂易，时谓之“谪仙”，不知所终。

按蔡某因有养鼠之术而被称为“谪仙”，则其术即可称“仙术”。养鼠和养奇禽事相类，而仙术和道术义相同。

或谓“举有道”即“道举”，其实不然。按唐朝的“道举”乃是指“明四子科”，所试内容为老子、庄子、文子和列子（详《唐会要》卷七十七“崇元生”条）。而唐朝的“举有道”之类科目，则是考试某种特殊技艺，如开元二十二年（徐松《登科记考》引作开元二十一年）三月诏曰：“道术、医药举，取艺业优长、试练有效者”（据《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条制一”）。

一般认为，李白自15岁（开元三年）始游学蜀中，25岁（开元十三年）出蜀远游。从徐松《登科记考》和岑仲勉《〈登科记考〉订补》所收集的史料来看，只有开元四年七月的一个诏令说要举有“道极专门”者：

诸道按察使扬州都督宋璟、益州长史韦抗……宜令各巡本管内，人有清介独立，可以标映士林，或文理兼优，可以润益邦政者；百姓中文儒异等，道极专门、或武力超伦，声侔敌国者，并精访，具以名闻。（见《唐大诏令集》）

按“道极专门”，意即道术高超而专精一门。绵州，属剑南道按察使管辖，其刺史以李白和东严子有“养奇禽千计”之术而举“有道”，则恰与此诏令所言举有“道极专门”者相合。因疑“州举有道”事，可能就在开元四年秋。

或谓“州举有道”之年若如上述，则李白隐岷山之阳也就只能有一年左右，这与他说的“巢居数年”岂不矛盾？按“巢居数年”上有“白”字，是单言李白自己的行为，“不迹城市”下当用句号标点。自“养奇禽千计”以下却是兼言自己和东严子事。如此，李白才能说“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看来，李白养奇禽的“道术”，实际上是学自东严子，所以李白要掌握这门“道术”，也不须很长时间。换言之，“巢居数年”乃是总括隐岷山之阳的时间，而“州举有道”只不过是这“数年”中发生的一件具体事情。李白着重述说这件事的用意，则是要用一个最典型的实例来证明自己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具备“养高忘机”的美德了。

《上安州裴长史书》如何安排诸事的先后顺序，乃是出于论辩层次的考虑，而《新唐书》的叙述也可能出于某种误解，但这都不妨碍我们另据史料来考察“州举有道”之年，并作出很可能就在李白干谒苏頌之前的推断。而这一推断与《上安州裴长史书》和《新唐书》的叙述顺序相同，则不过是一种巧合。

关于“岷山之阳”，杨慎《李诗选题辞》谓指匡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谓指青城山。这两种说法在当今李白研究界各有支持者，并展开了争论。我在这个问题上则只想谈一点浅见，即从唐朝的科举制度来看，诸州刺史奉诏举荐人才，必是举当时在本州者，所以绵州刺史举李白和东严子以“有道”这件事本身，就已表明他们当时的隐居地是在绵州境内。青城

山在唐属蜀州，而匡山在绵州。这样，我以为“岷山之阳”指匡山之说更为可信。当然，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例外，也就是说，绵州刺史到蜀州的青城山去“亲睹”李白和东严子的养奇禽之术，且举以“有道”并非绝无可能，但这要用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否则，我以为“岷山之阳”指青城山之说就难以成立。

（原载《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李白遇司马承祯之年考

李白曾在江陵遇道教一代宗师司马承祯，颇受嘉许，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写为《大鹏赋》，并有序记其始末。天宝初，太白待诏翰林，名动京师，此赋“时家藏一本”。太白得遇承祯，不仅使他写出了一篇不朽作品，而且使他提高了在道教中的声望，加深了与道教的关系，诚可谓唐代文学史和道教史上的一段佳话。关于遇承祯的时间，其《大鹏赋序》只用了一个“昔”字，研究者则多认为此即太白开元中初出蜀之年。但此年也难以确知，故众说纷纭，迄今莫衷一是。这个问题的存在，对于推考太白出蜀之年，及其婚安陆许氏以前的游踪，自然也不无影响。以往，多从太白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则拟以考察司马承祯在开元年间的行迹为主，希望能澄清一些是非，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

司马承祯，字子微，两《唐书》均有传，今人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詹鍈《李白诗文系年》更博采《道藏》及其他散见资料，多补正史之缺略，但其考辨仍有遗漏，笔者不揣浅薄，试结合二位先生之所得，再谈几点管窥之见。

其一，《旧唐书·司马承祯传》云：

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

遣之。

但据《旧唐书·玄宗纪》和《资治通鉴》记载,开元十年,玄宗在东都洛阳,十一年春正月由此而幸北都太原,三月庚午(五日)驾至西都长安。因知承祜离长安归天台山,实当在开元十一年暮春三月,本传误。

其二,承祜于开元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作《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说“将游衡岳,暂憩茅山”。而卫胥(凭)《唐王屋山人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说:

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动洲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

卫胥系承祜弟子,《庙碣》立于天宝七年(据《金石录》),所记当可信,则玄宗似又在开元十二年冬或十三年春召承祜入京。其实却不然。今按“明庭”即“明堂”,唐在东都洛阳,制在季秋九月祀,而开元十二年秋玄宗在西京长安,冬十一月始幸东都,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也均不载本年有大享明堂之事,疑《庙碣》所言“十二年”误。查杜佑《通典》卷四十四记载:

(开元)十年,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事礼。二十一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

其下注云:“时起居舍人王仲邱建议曰:‘《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经》……’”按《旧唐书·礼仪志》(卷二十一)也

记载：“(开元)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时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议曰……”《通典》注所引王仲丘建议，在此则为最末一段，二者文字略异。又《旧唐书·玄宗纪》说，开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之”。因知玄宗复行明堂大享之礼，实在开元二十年九月，《庙碣》所言“十二年”当是“二十年”之误。“动汧水之驾”，典出《史记·封禅书》：“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而吉。”《庙碣》则以此指玄宗在开元二十年冬十月幸潞州及太原。是知开元十二年冬，承祯当在衡岳。

其三，张九龄《登南岳事毕谒司马道士》诗云：

将命祈灵岳，回策诣真士。

绝迹寻一径，异香闻数里。

分庭八桂树，肃容两童子，

按《全唐文》载《遣官祭五岳四渎风伯雨师诏》说：“宜令……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在此诏下注开元十四年正月，而《册府元龟》卷二十六则记载：“(开元)十四年六月丁未(一日)，以久旱分命公卿祭山川”。张九龄又有《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诗记此行时令：“缅然万里路，赫曦三伏时。”则张九龄于本年夏六月初奉使祭南岳和南海，谒司马道士诗所言“异香”当指桂花之香，因知承祯本年秋也在衡岳。

其四，《旧唐书·司马承祯传》又记载：

(开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

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承祜因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真人降其职……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祜推按道经，创意为之。

按“又召至都”之“都”，当指东都洛阳，则承祜“至都”必在本年冬十月玄宗回长安之前。又《南岳小录》云：

真君庙，在岳观之东五十余步，本与司天王同庙各殿。开元中，司马天师上言五岳洞天各有上真所治……是岳启夏之际，洁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长备焚修洒扫，即开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

据此，玄宗本年召承祜至都，则又当在春夏之际。但《通典》卷四十六之注和《唐会要》卷五十均说，承祜上言立五岳真君祠是在开元九年十二月。《册府元龟》卷五十三又记载：

（开元）十九年正月壬戌（十三日），置五岳真君祠庙，各于岳下选德行道士数人焚香洒扫焉。初，司马承祜隐于天台，征至京师，承祜因上言：五岳皆洞府，各有上真人降任其职……

按“征至京师”，盖指开元九年玄宗召承祜至西京长安，则《元龟》也谓承祜上言别立五岳真君祠是在开元九年。又按《金石录》卷六著录：《唐北岳真君碑》，房凤文八分书，开元二十年正